

文化暴力与个体突围*

——黄青松小说集《坐床》的文化学解读

刘 晗^{1,2}

(1. 南京大学 中文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2. 吉首大学 文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青年作家黄青松的小说集《坐床》集中对花桥这个地方性文化价值系统中无处不在的隐性暴力进行了书写,向我们展现了个体生命与这种地方性价值系统的认同与背离的内在紧张关系,以及在这种地方性价值系统中个体的艰难突围和在传统价值系统崩溃之后现代性价值建构中出现的人与人之间情感、价值关怀缺失等文化问题。由此,黄青松的写作具有了一种区别于其他作家的胸襟、气度和使命感,同时也彰显了其写作在今天这个文化剧变的社会中所具有的独特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坐床》;文化暴力;个体突围;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7)02-0075-04

《坐床》是青年作家黄青松新近出版的小说集,是作家近年来用力最多、打造得最为精致的作品。《坐床》以花桥这个湘西腹地小村落为地域背景来展开叙事,来描述人的生命体验、情感诉求和生存形态,作家最为集中地对花桥这个地方性文化价值系统中无处不在的隐性暴力进行了书写,向我们展现了个体生命与这种地方性价值系统的认同与背离的内在紧张关系,以及在这种地方性价值系统中个体的艰难突围和在传统价值系统崩溃后现代性价值建构中出现的个体性的片面突出而导致的人与人之间情感、价值关怀缺失等文化问题。表达地方性价值观念,黄青松擅长用地方性的文化习俗、仪式和文化成规等文化符号来作为手段。黄青松清楚地看到文化习俗、仪式和文化成规是地方性文化价值系统中观念性价值的直接表征,是地方性文化价值系统具体化的表意符号。它既规范着生活于这一地方的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分析这种地方性文化形态的具体文化文本。因此,黄青松《坐床》中的叙事大多是将人的生存形态置于文

化习俗、仪式和文化成规的紧张与对抗的关系中来进行。

《坐床》是这本集子里的同名小说,小说其实是对一个地域性的文化习俗的描述。不同于民族志和民俗学的记叙,黄青松将文化习俗与个体的生命情感、个体的自由体验、幸福感受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将人的情感态度置于显要的位置,使一个在具体地域意义上具有普适性的文化习俗变得不可重复、不可替代和具体化。在花桥这个生存世界里,坐床是这样一种文化习俗:哥哥娶了妻子,但由于各种不可预测和抗拒的因素,诸如疾病或者事故而死亡,那么为了留住嫂子不外嫁,弟弟得与寡嫂结为夫妻,这叫“弟坐兄床”。在花桥这个文化系统中,坐床既是合情的也是合理的。《坐床》中“我”的父亲、嫂子的父亲、村长代表着这个文化习俗的坚定的认同力量,他们是这个习俗得以延续的维系者和这种文化习俗忠诚的执行者。哥哥去世后,“我”从广州赶回来,父亲要我“坐床”娶寡嫂,但“我”有意中人,这个意中人是井妹。从内心的情感上来说,“我”是不愿意“坐床”

* 收稿日期:2007-02-22

作者简介:刘 晗(1976-),男,湖南祁阳人,吉首大学文学院讲师,南京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文学批评、文学基础理论和西方文论。

娶寡嫂的,但迫于父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压力和地方性文化对这种习俗合理性的设定,最终“我”以自我本真感情的隐匿和牺牲作为代价在这个特殊的时空里对“坐床”这一文化习俗又一次进行了强化。

花桥这种地方性价值系统对“坐床”这个习俗所持的态度是肯定的,并有一种将之上升为普适性价值的努力,但事实上它并不能给每一个人都带来幸福和自由。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坐床是对人的幸福和自由意志的一种戕害。在这篇小说中,嫂子面对这种文化习俗是一个沉默者,但在这里沉默即为赞许与肯定。“我”曾经在内心是对抗者,“我”和嫂子举行了婚礼,但“我”却觉得自己跟嫂子的关系浑身不自在,跟嫂子同床时满脑子都是哥哥的幻觉。这其实是一种对抗,但这种对抗的力量是微弱的,很快就被来自文化习俗的暴力所征服和吞没,最终我跟嫂子过上了“正常”的夫妻生活。正如法国思想家福柯所揭示的,每一种文化、价值、知识、信仰都是一种权力,是“一套在任何既定时刻决定能够思想什么和不能思想什么、能够说什么和不能说什么的先验规则”^[1],同时这种先验的规则具有强大的暴力性。事实上,“坐床”习俗的每一次实现都是一种地方性的文化价值观念所蕴含的权力和暴力的得逞。在这里,“我”被吞噬了,不存在了,变成了这种地方性文化中的同质者。“我”被地方性的文化价值规约了,变成了“我们”,“我”向文化暴力臣服。

井妹在这个具体的“坐床”习俗中是实际的受伤害者。井妹跟“我”有爱,从时间的维度上讲,彼此有意思都半年多了。井妹跟“我”的感情萌生是在兄亡之前。但在这种文化价值系统中,“弟坐兄床”具有凌驾一切之上的优先性,是一种强势话语。因此“我”跟井妹的爱情得让位于“坐床”这种文化习俗。井妹原打算待“我”将养猪场办起来给“我”当帮手的。但面对这种文化习俗的强势话语的暴力,她无奈、无助,只能选择外出打工的方式进行逃离。在《坐床》这个小说中,井妹是“坐床”这一习俗的真正意义上的无声的对抗者。这也预示着这种地方性文化自反性力量的萌生和个体艰难突围的开始。黄青松在《坐床》这个小说集里反复叙述了各种各样的关于逃离的故事。

如果悬置小说本身所标示的时间形态,我们可以从黄青松的小说中清楚地看到这种对抗文化

暴力的自反性力量萌生发展的内在逻辑轨迹。《打样》其实也是一种对抗文化暴力的逃离,但形式显得更为激烈。打样同样是一种习俗,这种习俗实际是一种欺骗行为。即如果某个人长得不得体面,但为了娶一个面容娇好的女子为妻,就得请一个长得俊朗的男子替自己去做进洞房前的所有工作。在这种文化规约里打样行为同样是具有合情合理性。天顺是这篇小说的主角之一,是一个专门替人打样的样儿。“在村人的眼里,天顺是能人,也是功臣,他自己也这样每每在心理受活,不无自豪。”^[2]促使天顺对这种打样习俗从认同者到对抗者,从有成人之美的得意到罪恶感、忏悔意识的萌生的直接事件是被打样的竹叶儿嫁给黄家五少爷后的不幸的非人的新婚生活。这使他对自身行为和打样这种文化习俗的弊病进行了反思,从而变更了自个儿的文化评价系统,使自己从认同走向对抗。他知道自己无法改变打样这种文化习俗,他只能选择从这种地方性的文化规约里逃离。天顺逃离的方式是用拳头砸碎了一个碗,用碗的碎片往自己脸上抹。从而使那张打样与演戏得以可能的俊俏的脸得以毁灭。没有了俊俏的脸,决定了他从这个打样的行当中的出局,也决定了他本人从这种文化习俗的在场性中的逃离。

《阳戏》则是一种文化成规的叙事。上寨的彭姓和下寨的向姓不知道是出于何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理由,虽同为一村,除了演阳戏外,素不来往,而且特别忌讳两寨人在情感上的事情,联谊、认亲、恋爱、通婚是绝对不被允许的。谁要在这个方面犯了禁忌,他将为整个寨子里的人不耻,被看不起,象是做了丧失人格的事情,被寨里所有的人奚落。这个规矩就好像这两个寨子的立寨精神纲领,每一个人都得无条件的服从,接受它的规训。上寨的彭姓的勇伯和下寨向姓的秀婶在男扮女、女扮男的角色反串的阳戏表演中曾经互生爱慕,但在各自寨子里的这条莫名其妙的成规面前,他俩都不敢越雷池半步。他们虽然也偷偷地时不时到墓穴里去约会,但在明处的公众形象还是各自寨子遵守这些成规的优秀寨民。勇伯和秀婶是这条莫名其妙的成规的受害者。然而当他们年岁老去,当勇伯的孩子长生和秀婶的女儿么也由于跟各自父母同样的演阳戏经历而互生爱意的时候,他们的爱情的合法性同样遭受到这条成规的质疑和否定。饶有意味的是,这条成规的实际维护者竟然是勇伯和秀婶。长生和么最后也只能在祭祀

祖先的仪式中双双选择逃离。选择在祭祀祖先仪式中进行逃离,其实这是他们对老祖宗这种莫名其妙的文化成规的对抗和对其非理性原则的控诉和拆解。

《匠》这篇小说叙述的是匠人在寻找自己的衣钵传人这一事件上所产生的文化暴力和对抗。匠人选择自己的传人的首要准则就是师门或者是祖传的文化规训即“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然而,这条男权中心主义和家族中心主义的文化规训注定要引起很多的情感冲突和世事恩怨。小木匠随师傅来药匠家给药匠病人膏肓的父亲老织匠造寿屋,这使他成了这诸多情感冲突的参与者和那些世事恩怨的聆听人。老织匠从祖上继承织布这门精湛的手艺,原希望儿子能将这门祖传手艺继承下去、发扬光大,但儿子药匠却本着对织布和学药这两种手艺的这样认识:“布料只能遮人羞,汤药却能治人病”,选择了去学药。老织匠以不认儿子作为筹码施以高压,但儿子还是去意已决,拜了药匠为师。从此父子在情感上产生了巨大的隔膜和对抗。虽然药匠曾经以对抗父权的身份出现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筹划自己的人生,为此自己还娶了老药匠比自己大十二岁的女儿作了妻子。药匠的选择事实上客观地满足了老药匠遵循的师门规训“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以致老药匠最后能欣慰而去。但当药匠年事渐高,希望为自己的这门手艺找个传人的时候,却又落入了这个文化规训中。女儿五五是女性,这个手艺她是不能学的。要传给一个男性,但自己又不希望自己的女儿离开,因此两全其美之策就是象岳父那样找一个人赘的女婿将这门手艺传授给他。故当曾经受过他医治的“天指头”再次托中人来表达想跟药匠学药并有入赘做女婿的意愿的时候。这正中药匠的下怀,于是药匠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这一答应,就意味着药匠必须以牺牲女儿选择爱情婚姻自主权的代价来实现自己的衣钵传人的选择。五五跟父亲的对抗是双重的。第一重对抗是对父亲所代表和执行的陈规的对抗,这门手艺规定只能传男不传女,但五五却一门心思想去学药,五五还要小木匠做了一个跟父亲樟木箱子里的小楠木匣子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将藏有外公留下的药谱的楠木匣子置换出来,并偷学了里面的药谱。她将冲破文化成规的个体意愿偷偷地付诸了实践。第二重对抗是拒绝父亲对自己情

感幸福和婚嫁事宜的包办代替。因为在跟小木匠的交往中,五五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小木匠。如果遵循父亲的决定就意味着自己将来要跟那个“天指头”过一辈子。这个孝顺的女子在选择自己的幸福上是毫不含糊的。因此她用“哪个答应哪个就同他过一辈子”的言说对父亲的决定进行了直接的否定。这种直接的对抗对药匠的打击是沉重的。药匠气急攻心,晚上就病倒了。

当老织匠寿屋竣工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小木匠立马就要离开。这对两情相悦的小木匠和五五来说他们彼此是难分难舍的。晚饭后他们双双走到后山,两个人紧紧相拥。药匠见了却是双眼浊泪,因为这是女儿对自己和那些文化成规的公然挑衅。于是药匠咕咚一声栽倒在地上。药匠最后同意“收”小木匠为婿,但条件是必须将自己的手艺传下去。不料,小木匠却拒绝了药匠的美意,并要求让五五去学。小木匠和五五的行为把药匠选择传人的“圣经”全部践踏了。最后药匠悲愤交加在木匠的倒马词中断气死去。药匠的死是为他心目中奉为神明的一种文化成规而死。他的死是一个文化隐喻。在《匠》这个小说中。我们看到个体对抗地方性文化成规的力量越来越大。个体从文化陈规里的突围越来越成为可能。个体要求自己掌握自己的未来、幸福、自由等变得越来越是一种自觉的首要的价值原则。这些逼迫着文化成规的松动和规矩的变更,呼唤着一种更人性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到来。这我们可以从老织匠那里看到这种文化成规本身的松动和变更:老织匠在将手艺传给儿子不成后,想将这门手艺传给身为女性的孙女五五,这就破除了只传男不传女的成规,可是五五却不愿意学。后来老织匠还准备把织布的梭子传给小木匠,想仪式性地完成他视为生命的手艺的传递,找到自己的接班人,这又破除了“只传内不传外”的规训,但也因小木匠不愿意而未果。老织匠对文化成规的调整和修改,说明了地方性文化价值系统本身的脆弱和退让,这是一种文化欲逞强施暴但又无能为力的征兆和象征。

《最后一场锣鼓》中病人膏肓的德贵老爹临死前表演的那最后一场锣鼓其实也是一个文化隐喻。隐喻着一种对过去文化的缅怀和曾经很强悍但如今寿终正寝没有生命力的文化的风光不再的必然。德贵老爹是抱着文化守成主义的心态来缅怀他过去的风光事业的。德贵老爹在过去是一个受人尊重的锣鼓手,他用锣鼓声的整齐划一的节

奏调度并指挥着花桥世界里的集体性的农事劳作。在这种文化里他以锣鼓手的生存方式确证和实现着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但在花桥世界里那种传统的崇尚群体性扼杀个体性的农耕文明毕竟已经被现代文明所击溃,变成了昔日黄花。田土分到户了,各家各户都单干了。代表着现代文明的犁田机也进村了,工作效率一天抵得上十几个二十几个劳动力。那种群体文化的经典形式集体劳作不再需要,德贵老爹从此失业了。德贵老爹在打完最后一场锣鼓就栽倒在他熟悉与热爱的土地上死了,这无不喻示着传统农耕文明和花桥世界里的旧的地方性价值系统的彻底瓦解和退出历史舞台。尽管有怀旧和复古的力量试图去复活它,但那毕竟是一种枉费心机的努力。它向我们昭示,所有逆现代性而动的行为都注定是一曲历史的悲歌。

“现代性作为一种后封建社会的行为制度与组织模式,其核心内涵是理性精神。”^[3]它介入乡村世界的农耕文明中会伙同乡土世界中的自反性力量迅速击溃和瓦解传统的封闭性的文化价值观念,但同时它也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山岗上的守望》石望老爹是带着失望和惆怅的心情每天坐在山岗上进行守望的。妹儿是石望老爹的孙女儿,是他唯一的亲人。高考落榜后,妹儿去了南方

打工。妹儿每次写给石望老爹的信从长到短,寄的钱从少到多。照片从充满乡土气息的清秀和灵气到具有现代都市氛围的时髦与洋气。这都说明了她对现代性的个体的都市文明的拥抱和对乡土世界的群体性农耕文明的抛弃。石望老爹对妹儿守望的失望和孤独,其实也是一个新的文化困惑。现代性文明突出人的个体性,使个体对自己的幸福负责成为一种首要的价值。这种价值的建立是以摧毁人的群体性关系作为代价的。人只关注自身,而不关注他者。走到极端,就可能甚至导致甚至连以血亲作为纽带的人伦亲情都会变得淡薄和冷漠。花桥世界中的文化的现代转型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孤独、冷漠、距离、陌生、信任危机这些情感类型是伴随着现代性的进程在人的情感体验中变得频繁和强烈的。黄青松的写作敏锐地从情感体验的维度发觉了现代性转型中我们要遭遇到的新的文化问题。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文化重建过程中怎样实现人的价值关怀这一值得让每一个人都来认真反思的问题。黄青松小说的这种独特的个体呼唤和文化重建中的积极的责任担当使他的写作具有了一种区别于其他作家的胸襟、气度和使命感,同时也彰显了自己的写作在今天这个文化剧变社会中所具有的独特意义与价值。

参考文献:

- [1] [英]路易斯·麦克尼·福柯[M]. 贾缙译.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61.
- [2] 黄青松. 坐床[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2.
- [3] 刘晗. 现代性与建构乡土美学的可能[N]. 文艺报,2005-6-30(5).

Cultural Violence and Individual Sally ——Cultur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n Huang Qingsong's Anthology of *Zuo Chuang*

LIU Han

(1. Chinese Departm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 Jiangsu Nanjing 210093, China)
(2. School of Literature, Jishou University, Hunan Jishou 416000, China)

Abstract: In his anthology *Zuo Chuang* Huang Qingsong describes the implicit violence in the local cultural value system of Huaqiao. He also displays the inner tension between the individual life and identity and separation of the local value system. Besides, cultural problems such as feelings among people, lack of value concern of the postmodernity are depicted. Hence Huang's work has distinguished itself with his breadth of mind, manner, and sense of mission, which also demonstrates its unique meaning and value in today's dramatic cultural change of the society.

Keywords: *Zuo Chuang*; cultural violence; individual sally; value